热线：96666 E-mail:xdkb@kuaibao.net 现代快报
责编:郑文静 美编:徐支兵 组版:丁亚平 2014.11.24 星期一

泪洒悠思悼高斯

文/李景端

获悉高斯同志仙逝，虽有所料，但一旦永别成真，仍难免备感悲痛。想说的话太多，姑且仿效民俗，点着三炷香，遥向高斯诉说衷肠。

头炷香，我崇敬您的功绩。您从投身新四军战地记者开始，一辈子献身新闻出版工作。在担任《新华日报》总编辑等任上，您不仅为办好报纸呕心沥血，还亲自写出不少重要文章。后来到出版局，又使江苏出版业的出书规模和经济实力，快速跃进全国的前列。您荣获韬奋出版奖等，可谓名至实归。刘杲先生写了一幅《悼高斯》的挽联："纵览中外融会古今万卷典籍播文化，笔底风云书林旗帜一代功臣铸春秋"。

第二炷香，我敬佩您的人品。您一生廉洁自律。当官不摆官架，不用特权安插亲属，前几年，4个子女中就有3个下岗。您依旧住在不足90平米要爬楼的旧房。您还擅长书法、篆刻和藏书。尤其是身患癌症后，仍学会用电脑，写出反映"文革"动荡的80万字长篇小说。

第三炷香，我感激您的提携。我全家被下放农村5年。1975年初，是您把我调进了江苏人民出版社，结束了我前半生"万金油"的工作生涯，开启了人生的重大转折。如果说，我在翻译出版领域多少做出了一点成绩，首先得感激您的识人与提携。我不是千里马，但您却是我知遇的伯乐。不仅如此，当我创办《译林》外国文学杂志，因为刊登侦探小说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，被权威人士"告状"而面临极大压力之际，又是您秉持公道，顶住压力，为《译林》的无辜力辩，坦然表态："如果有错，由我这个局长负责。"尽管这桩风波后来平息，但对您身为领导，在困难时刻，勇于爱护下属的精神，我始终心怀感激。因为您当时不仅是保护了我一个人，而是维护了《译林》的事业和它的未来。■

旧物
摄/张余阳

大学琐忆

文/张王飞

1981年冬天，扬州师范学院的苏式教学楼前，聚集了中文77级的160名同学，簇拥着老师拍下了年级合影。事后，班级又合影。两张泛黄的照片，至今被我珍藏在相册，每当拿出来端详，心又飞回了大学。

我初入校门，是1978年的3月6日。春回大地，呼应着学校迎新卡车上的猎猎彩旗，使我产生了幸福的眩晕。当车子从石塔寺西边经过时，远远地看到了扬州师院的大门。那校门因门前荒地的低洼，显得格外庄重高大、峻秀挺拔！我一时热泪盈眶。

对于一个农村孩子，一个文革中期的高中毕业生，一个在农村摸爬滚打了五年、希冀改变命运的青年来说，高校大门意味着太多的东西！内心那份五味杂陈，至今未敢忘却。

遗憾的是，这座如同我人生坐标的校门，在扬大合并办学之初，被校方一夜之间夷为平地。最文化的地方居然做了件最没文化的事，如今，这校门只能永远珍藏在记忆里。

第一任班主任是俱荣本老师。进校那天，在红楼宿舍区门口的小岗亭里，我见到了他，是个挺帅气的青年。我才到岗亭跟前，他就叫出了我的名字，并指定我做二班的班长。这一做就四年，毕业前还差点受处分。因为实习结束，我在没获得批准的情况下，让同学借来了一辆老爷客车，利用周末带领全班同学去无锡旅游，结果摊上大事儿了。回校晚自修时分，还没坐定，班委们就一一被"传训"，最后让我在全班公开检讨。已是80年代初了，学校仍不让我们这些老大不小的学生谈恋爱、学交际舞，组织旅游也受限制。

吴周文先生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任课老师。入学教育结束的那天晚上，一个身着灰色对襟中装的中年眼镜先生，突然来到了我班男生宿舍，用他不太流利的如东普通话问这问那，神情严肃，有种让人生畏的尊严。他一字一顿地问我："你就是班长吗？"我忙回答："是的！""你知道明天就要上课了吗？上什么课？"我干瞪着眼答不上来。"明天上午有作文课，我是你们的作文老师……今晚还不准备准备！"我当时真的捏了把汗，心想，这老师真厉害！其实，后来发现他特可爱。他是唯一在课前亲自跑到宿舍看望学生，并提醒学生做准备的老师，严肃的外表下，藏着慈父般的心肠。他教了我们一年半，每篇作文既有眉批，又有总批，错别字一一拎出，还把优秀作文印发给大家一一评讲。写作课还成了作品鉴赏课。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，就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。留校任教后，又在他带领下合作完成了《朱自清散文艺术论》一书。他和曾华鹏、李关元、孙露茜等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引路人、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恩师！

同桌王鸿海，上学前就是民办中学教师，功底扎实，还写一手好字。我们情同手足。课堂笔记唯恐记得不全，课后总是相互对照补充。他把从家里带的泰兴酥饼分一半给我，等我吃完了，还叫我直接到他枕头边上的饼干盒里去取。他不会喝酒，可他家乡有一种73度的土烧酒，知道我好一口，就几次三番用盐水瓶灌上给我带来。他还送过我好几把毛刷，堵物思人，至今我还用着。上学前，一个漂亮姑娘与他订了亲，怕他上了大学有变，就催他尽快结婚。于是，他入学的第一学期中途就悄悄溜回去把婚事办了。返校后我问他："感觉怎么样？"哪知他憨笑着回了一句："嗨！没什么意思，就那么回事儿。"

因调换宿舍，我跟王东明等八位同学住到同一宿舍。当时食堂已由八人一桌的桌餐改成了分伙制。东明学习好，有才情，那时就发表文章了。我打心里佩服他，关系热乎起来。原来他跟同桌杨生华合伙吃饭，结果我就当了"第三者"。从此，我们三人的饭菜票、开水券合在一起直到毕业。东明回泰州带来的蟹黄猪油是最美的调味品，挖上一大块，往热烫烫的青菜里一拌，那油香和鲜味顿时扑鼻而来。

大学值得回忆的人和事太多了。已越来越成为我心中最美好、最温暖的一种记忆。■

感情问题

文/江锡民

朋友告诉我，网上有我的旧书稿在挂拍。

点击查看，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果然查到了"江苏人民出版社用稿江锡民《短篇小说集/感情问题》"。白底红格的稿纸上，"感情问题"的"感"字还是用当时流行的简化字书写的，干字下面加个心。编辑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删改的痕迹也清晰可见。

那是40多年前的旧事了——文革从"破四旧"进入"立四新"阶段，最初的社会骚乱已经平息，安定下来的人需要精神食粮，北京出版了浩然的《金光大道》，上海出版了小说散文诗歌集《朝霞》，江苏也要出版同样主题的文本。那时，文坛高手多因写作"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牛鬼蛇神"被"打倒"，文学，亟需新人。

我们五个只读了初中就进厂的小青年，因在无锡文化宫的业余写作而被选中。四男一女，来自压缩机厂、耐火材料厂等。我在他们中间写作基本功是最差的，但沾光的是我来自商业系统，题材决定论吧。

那是一个粗粝的时代，我们的文字也是如此，青涩，粗粝，带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撞，有很多概念化的时代印记。我被印刷成文字公开出版的第一个短篇完成了。题目叫《感情问题》，内容所涉无关男女私情，亦不是血缘亲情，而是讲饭店为顾客服务时应带的阶级感情——这会让如今的90后笑喷了的，却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语态。

短篇小说集公开问世时，只有我和那位女作者的作品最终入选。也没拿到稿费，只是收到两本样书，封面上是工农兵图案，雄赳赳往前伸着右胳膊，弘二头肌粗壮凸显。这是那个时代铺天盖地的审美风格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快被扬弃，近些年却又出现在留洋画家的现代派画展上。

小说集出版不到一年，政治风向再次翻篇。紧接着，文学影响力有了次爆发式冲顶——上世纪70年末到80年代中期，随后就是物质女神、娱乐女神接管潮流了，早年的文字，很快被柴米油盐挤压进记忆角落。

想是命运的安排，当年被选出的五位，后来再也没集体相聚过。那位女作者，一度成为本地小有名气的女作家；做了我南师大学弟的那位，90年代开始经商；最快从文学中脱身的那位，走上仕途；还有一位，听说他出过微型小说集，可一直也没联系。有次挤公交，发现位戴鸭舌帽者和他极相似，喊了他两声，对方却没反应，还把脸转过去了；没等我挤过去看个究竟，对方已匆匆下车了。

时代匆匆，文学匆匆，人生匆匆。是为文，追忆我们的时代，和时代赠与我们的感情问题。■

一块手表

文/许海峰

双手接过那块老式"上海牌"手表时，我感觉拥有了一个宝贝，瞬间富有起来。毕竟，在此之前，我一直是隔着柜子的玻璃窗远远地看着它，即使翘起脚尖，也只能看到它银灰色的外壳。如果不是期末考试这个正当理由，我没办法在短短的几天内拥有它。

手表的直径比我的手腕还要粗，戴是不可能了，就放在铅笔盒里，隔着铁皮听"滴答滴答"动听的声音，犹如清泉落深潭，没有闲事挂心头，有形的时间就是享受而不是驱赶自己的鞭子。

然而它却丢了。在考完试准备回家时，我放下铅笔盒，去了一趟厕所。有人偷走了它。

那年我13岁。在校园里茫然焦急地寻找，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每个人的脸，希望找到哪怕是一点点蛛丝马迹。

最终，我还是失望了，看着最后一抹晚霞隐去，月亮孤独地顺着树杈爬上去、爬上去，冰冷冷地很像我当时的心情。

因为丢了表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父亲狠狠责骂。晚饭时他满面通红地用筷子点着我的脑袋，额上青筋蜿蜒。他喝了很多酒，翻来覆去地说那表买来时，是卖了两口袋葵花籽凑的钱，用了几十年都没有修过。他没有吃饭，搭了条毛巾去了房子后面杂草掩埋的水塘，从头到脚埋进水里，头发水草样的随水摆动，很久都没有从水里出来。

当时，家里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外，没别的能与现代化挂钩的东西，那块手表一定是父亲年轻时唯一的追忆与珍惜。

从此以后，父亲再没有用过手表。我弄丢了父亲的时间和青春岁月。心里有了无法消融的隐痛。

那块手表是我和父亲共同的怀念，我相信他也从不曾忘记年轻时最为钟爱的东西，只是不愿意表达。我却不同，时常想起那块曾在我铅笔盒里走动的老朋友。可恶的贼，剥夺了一个孩子原本就很短暂的拥有和满足。

"上海牌"，老朋友，我是那么地想念你，现在的你，是在一如既往悠悠地向前走着，还是早已被丢弃在某个肮脏的角落？一个28岁的孩子在想念着你，你知道吗？■